

十七年历史剧创作

话语形态论

温潘亚——著

象征行为

民族寓言



十七年历史剧创作

话语形态论

象征行为

民族寓言

温潘亚
—— 著



Copyright ©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象征行为与民族寓言：十七年历史剧创作话语形态
论 / 温潘亚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5

ISBN 978-7-108-05205-6

I. ①象… II. ①温… III. ①话剧剧本—历史剧—文
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5981 号

责任编辑 伍 众

封扉设计 朱丽娜 张 红

责任印制 卢 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版制作 北京红方众文科技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5月北京第1版
201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12.75

字 数 294千字

定 价 48.00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序一

丁帆

作为断代的门类文学史研究，无疑，潘亚此书的出版对 17 年历史剧的宏观把握与微观重读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对 17 年历史剧创作的研究多集中在单个作家作品的格局之中，其方法也主要采用政治 / 艺术二元对立的研究视角。而潘亚的这部专著却从有限的创作中抓住要害进行整体性的分析，发掘出了“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极为独特的现象”，为文学史的重估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对这些作家作品的重新发掘与评估，乃是 20 世纪历史剧创作发展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历史环链。潘亚选择话语形态理论为视角，将 17 年历史剧概括为 4 种特征是有充分的理论依据的：

“17 年历史剧是在一种泛政治化创作语境下生成的，它负载着强烈的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使命，因而，被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

它是在现代话剧特别是历史剧创作传统以及对中国传统戏曲有所借鉴并努力民族化的基础上，在革命文学、左翼戏剧、延安文艺及前苏联戏剧的直接启示下生成的。”“既认同与归附于权威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又有一定偏离的独特的话语形态体系。”这种对于创作背景的分析大体是准确而客观公允的，17年历史剧从源头来说是带有“左翼”色彩的，但就具体的作家作品来说，又呈现出不同的美学特征和个性风格。时代与政治，共性与个性，就像形影不离的孪生兄弟一样紧紧附着在17年文学之中，其历史剧当然是更为凸显的艺术门类。

“它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进程中的一个独特的现象，是现代剧作家们在建国初，面向现实题材进行创作话语转型失败后，形成的政治无意识升华的一种集体的‘社会的象征性行为’。在泛政治化的创作语境下，史剧家们选择历史剧的形式进行话语言说，充分体现对17年中主流意识形态的顺应或反抗，亦即以其符号形式的建构体现出自身独特的意识形态功能，表现出现代剧作家们强烈的现实关怀，即试图通过重新编写历史故事把历史经验复活起来，以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我以为潘亚的这一论点从某种程度上是击中了17年历史剧创作中作家主体性的要害，为揭开17年历史剧的精神面纱给出了准确的答案！这个答案虽然是常识性的解释，但是，由于多少年来我们习惯了用“左”眼去看戏剧，很难看见它们的本质特征。如今，我们顺着他指引的理论视点看过去，便可透过历史的雾霭，一眼望穿它的真实内涵。“它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史剧家们选择令今人会产生共鸣的历史事件、人物、关系和冲突，在历史的视野中，采用独特的叙事策略和叙事规则，对其重新进行调

动和安排，从而再评价他们的得与失、荣与辱，以达到‘教育’人民的作用。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构成。”对于17年文学所构成的精神影响，我是向来没有低估的，但是，我始终认为这其中的精华与糟粕却是这个物化时代的人难以廓清的哲学命题。这种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是夹杂着可卡因成分的，是需要我们的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做出客观公允的价值判断的艰难命题。

“这25部历史剧深深地凝聚着17年中，特别是1958—1962年间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所赖以生成的信息基因，流露出特定年代权威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动机，构成了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镜像。它既折射出权威话语及时代流行的政治理念和工农兵文学创作模式的规训、制约与影响，又真实地体现出特定年代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态与价值向度，昭示着史剧家们内心世界潜隐着的种种矛盾的心理与欲望。”无疑，潘亚对此“镜像”式文本的理解是深刻的，是有自己的价值理念统摄的，但是，关键是看他在具体的论证过程中采取的是什么样的立场和方法。围绕着作者设定的4个板块，我以为其论著的主体构架是有理论意义和价值的。纵览其结论，虽然我尚有不完全同意的观点，但是，基本的价值判断是一致的。我最为欣赏的是全书对第二板块的分析，其结论中有着深邃思考：

“在文体形态上，我认为17年历史剧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历史’呈现方式，即‘尊古写剧’、完全虚构、‘失事求似’，但由于历史‘现实观’的强烈制约，亦即对‘古为今用’的特别重视，使得它尤为强调‘失事求似’。而构成历史剧的历史性、当代性、主体性三种文本形成了共渗互动的关系。由于强调‘人民创造历史’的观

念，使得 17 年的历史悲剧普遍不悲，与表现现实题材的工农兵文学相一致，历史喜剧很少运用‘讽刺’和‘幽默’的手法，多以大团圆的结局呈示喜剧性，因而在情节开展方式上是忌悲忌喜，正剧统一；在结构模式上，17 年历史剧创作大多采用情节推进式冲突结构，这其实是现实生活中日益强化的阶级冲突、斗争意识在历史剧创作中的折射。由于政治理念的侵蚀，许多史剧在结构上出现了‘非整一性’问题，并将历史个体意志间丰富多元的矛盾冲突简化为二元对立的单一结构，普遍采用与颂歌叙事相一致的历史‘苦难’叙事模式；在人物形态上，17 年历史剧创作形成了以扁平型为主的人物形象谱系，立体型人物屈指可数，而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是好/坏、善/恶的阵线分明，且均具有各自的代码与功能。男性史剧家们通过‘拟代女性写作’方式刻画女性人物形象，以历史女性形象演绎政治理念，回归爱情本体的女性话语是少之又少，女性话语呈现出一种‘缺失’状态；在语言系统中，由于对语言风格的探索与追求不会触及权威话语的禁忌，使得 17 年的许多史剧在实现双重超越的基础上，普遍采用‘历史/现代’形态的语言媒介系统，形成了亦古亦今、化古为今的独特语言风格，以曹禺、老舍为代表的一些史剧家还在语言的探索中回归了自我。但在总体上仍是以宣传说教型语言为主，普遍采用政治性的语汇。”这无疑是在给 17 年历史剧“点穴”，通过微观分析所得出的宏观结论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与历史的必然，是从历史现场抽绎出来后，经过现代性价值理念的过滤与思考后的结晶。

而对第三板块的分析，我却尚有不完全一致的意见。作者说：“我认为 17 年历史剧在承载强烈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同时，许多史剧还潜

隐着史剧家们对历史与生活的独特思考，即在历史中重建启蒙话语，包括借历史‘干预生活’，对人与自我的关注与呼唤和对国民性弱点的揭露与反思；有些史剧家甚至在用生命感受历史，如郭沫若的‘蔡文姬就是我’，田汉‘长与英雄共魂魄’，师陀在《西门豹》中表现出的孤独而痛苦的灵魂，等等。”如果说在17年文学中尚有个别作家还保有残存的现代“启蒙”自觉意识的话，那么，绝大多数的作家是没有、也不会有“在历史中重建启蒙话语”的主体意识的，启蒙意识更多的是被强大的主流意识形态遮蔽和淹没了，而凸显出来的是却是普遍的“奴性意识”。尤其是作者以郭沫若为例，就显得更不合适了。

总之，此书的出版是对17年文学中历史剧的一次重新价值定位和理论爬梳，其文学史意义是大于纯学术意义的，因为，它在学理层面的建构是改变以往不切实际的历史性选择：“我选择‘17年历史剧创作话语形态论’为题，是为了考察17年历史剧创作话语所遗存的对新时期历史剧乃至话剧的影响，并从中阅读出有益于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精神资源。它并不仅仅是出于我个人的兴趣爱好与学术积累，更重要的是适应21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学术发展的需要，并立足于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建设而做出的理性思考。”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学术动机——那种对重新建构文学精神资源的理性思考——这才是真正的学术根基所在。

温潘亚是一个勤勉的学者，他不但勤于思考，而且出手也快。从他的学术成果来看，不仅数量颇多，而且质量也高。三年的博士后经历，使他在学术上更加成熟了，其学术收获颇丰，值得欣慰。但我总以为潘亚如果能坚持在学术的板凳上再坐上个十年八载，一

定会出更多的学术成果，取得更高的学术成就，可惜他的行政事务缠身，在很大程度上牵扯和制约了他的学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愿他在百忙之中能抽出时间来坐在学术的板凳上保持自己的学术追求。

是为序。

2013年12月30日于紫金山南麓

序二

杨洪承

温潘亚教授的专著《象征行为与民族寓言——17年历史剧创作话语形态论》即将付梓，他希望我写一篇序。这是每位学生都会向老师提出的要求，又是每位老师难以拒绝的事情。传统观念下师徒如父子，现代理念以人为本，互相尊重，师生如朋友。因此，由古至今此“序”非写不可矣！

此书是潘亚以我所指导的博士论文《泛政治化语境中的历史叙事》为基础撰写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从2003年确立选题，到现在的定稿出版，历时11年，无数次的调整和修改，其间的努力与艰辛一定是非常可观的。回想我指导的三年，我就颇有感慨，可以说从选题到写作，乃至最后答辩的过程，与其说是导师的指导，倒不如说是师生共同交流讨论的过程。实际上，导师不过是论文的第一读者，

而且是必须给作者提供反馈意见的读者罢了。客观地说，这部文稿的酝酿、写作，乃至最后的定稿，我指导的很少，督促、批评的时候多，但是，今天回念这一段的时光，深感已进入永久记忆的师生情缘，可能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慢慢“牵手”的。

当初，潘亚与我商量这个选题的时候，我是很矛盾的：第一，我觉得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对17年文学重新进行反思性的研究多集中于文艺思潮、小说、诗歌等，对17年历史剧的整体性观照研究却是一个很少被涉及的课题，特别是系统的整理和重评更是付之阙如。在当前博士论文选题难的情况下，潘亚初次向我谈选题想法时，我从心里较为赞同，但也有一定的顾虑；第二，别人不做的课题并不等于别人没有发现，关键是研究对象本身的资源价值何在？17年历史剧创作中代表性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还是比较多的，文学史研究中未提到的其他历史剧作品究竟还有多少？这查找起来十分困难，选题有一定的风险。这是其一。其二，17年历史剧创作服务于现实政治，缺乏文学性的基本定位似乎也是有共识的，那么，该选题能有新的研究角度吗？在开题前，我将这些想法与潘亚进行了一次认真的交流，并且明确指出这两点，即如果选择了这个选题，那么最重要的是在已有同类成果基础上要有明显的推进，形成的研究成果对以后其他再思考17年历史剧创作的得与失时应该是必须阅读的文本，并且潘亚个人也必须由此课题的研究确立自己以后的学术致思方向。另一方面这一选题能否在已有论及较多的单个历史剧文本的基础上，再收集到其他的同期作家作品，新的史料的挖掘对于该课题的研究突破至关重要。

潘亚最终还是选择了这个极具挑战性的研究课题。他不拘囿于郭

沫若的《蔡文姬》《武则天》，田汉的《关汉卿》《文成公主》，曹禺（执笔）、梅阡、于是之的《胆剑篇》，老舍的《神拳》等文学史已有定评的几部历史剧，首先从资料入手，先后去了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以及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等图书馆，遍查我国 1950、1960 年代的期刊和出版物目录以及相关报纸、杂志、文艺创作集、剧本等，发现了一批少有人提到的历史剧作品，使研究对象的作品总量达到了 25 部。更重要的是，随着研究对象的逐渐扩大，他在重读已经熟悉的文本中又获得了一种新的历史视阈，即 1950—1965 年间创作的 25 部历史剧作品，从总量看并不大，但却构成了既是一个独立完整的研究对象，又是超文本的历史现象。以往的当代文学史研究对某部历史剧作品或某个作家的解读，虽然局部或个别较为深入，但是从历史整体形态把握作家作品的丰富而复杂的文化内涵却明显不够。17 年历史剧创作是一个整体的历史性文本，又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政治隐喻性的复杂文本。自然，直接以社会学、政治学或者纯文学的方式来解读这些文本，或做简单否定和肯定的判断均是不足取的。

这样，找到适合“17 年历史剧创作”研究的最佳切入角度和理论方法，是潘亚接下来又一个用心探究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个课题的难点所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话语形态”视角，应该是较为吻合研究对象的，因为潘亚在对该理论的理解和消化上颇下了一番工夫。在“导论”中，他从历史剧创作主体、历史剧的意识形态性、17 年泛政治化创作语境、话语形态视角的内涵这 4 个层面，将“17 年历史剧创作”与“话语形态”之间的关系和基本元素做了比较清楚且系统的界定。尤其对“17 年历史剧创作话语形态”进行

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话语生成论、话语构成论、话语价值论和话语消隐论等4个板块的构架与思路呈现出其理论思辨的缜密和勾勒线条的清晰。他将“17年历史剧创作”纳入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和17年文学主流形态中来考察，以“话语”理论的巨大覆盖性和文化历史隐喻性剖析和解构17年这一独特时段的历史剧现象，突破了以往仅注重单个作家作品解析研究的格局，最大限度地避免了“17年历史剧创作”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历史尴尬，从而相对客观地还原了“17年历史剧创作”的文学史本真。

基于对17年历史剧作品的深度阅读和新理论的科学运用，潘亚的17年历史剧创作研究获得以下几方面的重要推进：一、对17年社会历史语境下的历史剧创作进行了合理的整体性描述和归纳。对“泛政治化创作语境”侧重于“内在构成”的细致分析，还有对历史剧作家创作主体的“思维定势与创作心态”的深入解剖，对历史剧创作传统和创作实际主客观因素的辨析等方面，这使得“17年历史剧创作”首先被一个较为丰厚而开阔的文化场域烘托，并且它是属于与剧作家创作与生存环境联系着的文学史“文化场域”。这一场域不单纯是客观社会历史氛围，民族的、国家的政治实体所在，还有剧作家隐现的复杂的精神世界，民族的、国家的精神隐喻和象征等；二、从文体、结构、人物、语言这4个方面对“17年历史剧创作”内在结构图式进行细致的展现。这里不仅仅是“17年历史剧创作”一般特征的把握和创作规律的总结，而且通过具体的文本和作家创作实践的表现，在历史剧创作自身结构中揭示出历史的现实隐喻与戏剧的艺术想象之间的矛盾性和超越性，其意义是来自创作本身的分析，既使得新理论视阈落到了实处，又深化了“17年历史剧创作”的认知。比如，历史叙事究

竟如何拓展艺术想象的空间?戏剧家们丰富开阔的艺术想象力是怎样超越现实题材的?作者一一通过具体文本中的文体、结构、人物、语言的解剖,实证性地诠释了“泛政治化语境下作为一种历史叙事”的“17年历史剧创作”;三、通过历史语境的还原和历史叙事的图式分解,较好地摆脱了一些长期困扰“17年历史剧创作”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17年历史剧创作引发的“历史真实”的讨论,即基于历史剧的艺术独特性而强调“历史事实”的真实和基于历史剧的艺术普遍性而强调“历史精神”的真实。同时,还有几种观念形态的冲突,即“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统一论”“古为今用”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观”论等等。潘亚对历史叙事的阐释,旨在追寻“叙事背后的叙事”,揭示出17年历史剧创作背后所隐含的真正的现实精神,所讲述的“民族寓言”的内在含义。他并不在观念问题上做过多的纠缠,而是力图为17年历史剧自身的“精神”和“寓言”获得合理的阐释,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发现历史与艺术之间的理论、观念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辐射所构成的特殊意义。

潘亚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花了较大气力深入文本和叙事理论,现有的收获与他自身的专业基础和理论素养是分不开的。他在入学攻读博士学位之前就已经具备了教授水平,在文学史理论研究方面出版了两部学术专著,独立主持过江苏省“九五”和“十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各一项,并且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江海学刊》等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他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很强的独立科研能力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学习和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开阔的视阈、重视理论与文学史实践的结合、自觉的学术眼光。在这部专著中,潘亚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卡冈的“艺术

形态学”、伽达默尔的文学阐释学和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的“民族寓言”说，以及弗洛伊德的现代心理学等多种现当代西方理论共冶一炉，足见一斑。正是由于他擅长理论的思辨，也就形成了他的论文的独特之处，即将整体框架的缜密建构与创作特征的细致解剖相结合，特殊语境下历史剧创作的诸多外缘关系的甄别梳理与历史剧具体文本丰富而复杂的精神内涵的完整把握相统一。他对“话语形态”的具体内涵及其理论的建构，并结合研究对象所做的积极探讨，使得他专著的新见迭现，其学术意义表现在他发现了“对17年历史剧的研究不是仅仅封闭于文本之内，或与文本的简单相遇；相反，在历史语境中，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是开放的，文本因为与文本之外的文化法则和政治逻辑相连通，而使对文本的研究与超文本的研究连接起来，从而获得对于17年历史剧创作话语的历史性的、整体性的视野”。“对17年历史剧创作整体的研究有可能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种类型。”本书的这些立意较高的总结性观点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性，廓清了一些17年历史剧创作研究中的迷雾。自然，客观地整体审视本书，如果说还有什么不足之处，那么恰恰也是因潘亚对理论设计的偏爱，过分追求理论结构的周密，对于部分文本对象和个别文学史现象的解读有先入为主之嫌。今天，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亟待寻求新视角、新方法、新课题的突破，很容易滋生焦虑心态下的偏激，但旨在创新的科学研究通常是能够接受“深刻的片面”的，而不希望人云亦云的平庸之见。

说了这么多的话，只是第一个读者对本书的一些意见，陈述师生一起交流讨论的过程，也算是与潘亚博士毕业以后的再一次“叙旧”吧。这均是个人的理解和感受，充其量属于我们师生间的对话。

现在潘亚的专著即将出版面世，个人的学术成果就要放到广大读者面前了，尤其是要接受学界同行专家和熟悉其研究对象的读者审读。我的阅读感受和潘亚的学术观点也将受到不同读者的检验，期盼我的意见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同。学术专著的问世如果能够引起读者兴趣和同行的讨论和批评，那么何尝不是作者的幸事呢！

是为序。

2013年7月高温酷暑中于皖江城

前言

长期以来，对 17 年历史剧创作的整体进行系统的研究是我国学术界尚未给予充分关注的一个文学史问题，已有的研究多集中于郭沫若的《蔡文姬》《武则天》，田汉的《关汉卿》《文成公主》，曹禺（执笔）、梅阡、于是之的《胆剑篇》，老舍的《神拳》等少数几部单篇作品，主要采用政治 / 艺术二元对立的研究视角，得出的结论也以批判和否定为主。其实，就我目前已收集到的 25 部作品来说，17 年历史剧的数量还是较为可观的。而且其中的许多作品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更有一些作品被学术界公认为经典之作。这些历史剧主要是以现代剧作家们构成创作的主体，大部分创作和发表于 1958—1962 年间，从而形成了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极为独特的现象。

当然，本书无意于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对其进行全面的肯定。丁帆先生在《研究“17 年文学”的悖论》一文中明确提出应改变思